

第十八章

返渝善后

初回上海 凭吊故居

1946年4月5日，我从河内乘美机飞抵广州。在那里呆了三天，因没有便机飞往上海，只得转赴香港，嘱国民党外交部驻港联络站代购船票，准备乘船赴上海，并电重庆外交部告我行踪。

至于何日离香港，乘的是什么船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只记得送我到香港码头，向我挥手告别的两位友人：一位是在日本空军滥炸重庆山城期间，我在南岸汪山认识的著名电影演员金焰，另一位是三十年代才回国的留比同学华兴鼎。

大约四月下旬，终于到达我的故乡——上海。3月8日，我曾自渝飞沪，转机飞河内，因纯系路过，未得逗留。这次我的家属也已回到上海，自当团聚数日。自从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，“八·一三”上海抗日战役失利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上海南市大东门一带遭受大火灾。我老家自明末起世居于此，全部家产连同我收藏的中外书籍，统统化为灰烬。那时我坚持抗日，追随国民党政府先退武汉，继退重庆，顾

不及老家遭受浩劫，未返家乡已达九年。如今返沪，我便率领全家到老家旧址，凭吊故居于废墟之上、瓦砾之间，触景生情，不胜凄凉。在沪期间，探亲会友，略叙阔别之情，几番流连忘返……

约在五月上旬，我才返回南京。当时国民党外交部礼宾司长李骏告我，正当国民党军队开始从越北交防的时候，法国政府派参谋总长朱安将军为访华特使，于4月15日到达重庆，蒋介石设酒会欢迎，中法互授勋章。在法方授勋名单中有卢汉和我。李骏说到这里就把勋章证书一卷和宝星一匣交给了我。法国政府授予我的勋章名称是“领授荣誉军团司令勋章”。

我返回南京后，满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令人头痛的越南问题，搞些别的工作。谁知王世杰偏偏要我仍在部内协助他处理越南问题的善后工作，我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。

所谓善后工作，实际上只有两个内容：一是怎样实施中法协定，二是怎样应付越南反共党派。

怎样实施中法协定

1946年2月28日签订的中法协定于当年6月8日在南京互换了批准书。大约1947年1月，法国派来以法国外交部主管经济技术合作的司长亨利·莫为首的法国代表团；国民党行政院也组织了外交、交通、铁道、财政、经济五部组成的代表团，并指定我为代表团团长，同法方讨论怎样实施中法协定的问题。

会谈是在国民党外交部内举行的。法方提出两个具体方

案：

- 一、按照中法协定第三部分的规定，提出中越商约草案；
- 二、按照中法协定附件换文的规定，提出滇越铁路滇段和越段的经济技术合作计划。

这时，蒋介石一手发动的内战正转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他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被粉碎。仅在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的七个月中，国民党军队就被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五十六个旅，平均每月被歼八个旅。^①蒋军的有生力量大量被歼，兵力大为减少，士气日益低落。加上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政治欺骗的破产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兴起，蒋介石已面临日暮途穷的境地。再则法越战争自从1946年12月中旬爆发以来，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日益高涨，星星之火，已成燎原之势。鉴于上述形势，我和亨利·莫一致认为，这个实施中法关于中越关系协定的会谈，无法再继续下去，因而于1947年3月26日签订了“关于实施1946年2月28日中法协定的中法会谈纪要”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借此了案。就这样，我亲自参加谈判和亲眼看到签字的中法协定，在墨迹未干之时，就已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，还谈什么实施！

怎样应付越南反动派

自中法协定和法越初步协定签订以后，中国驻军逐步交防，撤出越南，国民党豢养的一批走狗和越南的反动派，眼看大势已去，纷纷来到中国。王世杰嘱我代为应付。记得当时我替王世杰代见越南反动派的头头计有：

1947年1月30日，越南革命同盟领导人阮海臣和越南国

民党领导人阮祥三来见，说他们先后被越盟逐出，特来中国要求援助。我按照王世杰“撒手不管”的方针，向他们敷衍一番，搪塞过去。

1947年2月18日，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陈天前来告密，说保大自从1946年4月赴香港后，正在同法国天主教会密商怎样返回安南，酝酿复辟。以后，保大果然回到南越，又当上法国的傀儡皇帝。

至于吴庭艳这位原逊皇保大的内务大臣，是1947年9月，由天主教南京总主教、伪国大主席团主席于斌^②邀我（当时我任礼宾司长）和欧洲司司长尹葆宇，在介寿堂便餐的席间介绍给我的。他也是来华求援的。于斌在进餐时侈谈了1943年开罗会议时，罗斯福怎样告诉蒋介石，战后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交还法国，而应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，由中、英、美三国共同受理……等等早已被蒋介石赖掉的那套东西。我当时仅谓事过境迁、今非昔比，敷衍过去。

于斌看出国民党方面对吴庭艳爱莫能助，就把他介绍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。以后这个反动头子，依靠美帝，打回西贡，充当傀儡，作恶多端，终于被杀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我回忆这段历史，不禁联想到法越初步协定签订之后，当武元甲同萨朗打得火热时，武元甲曾经说过：

“胡主席是无所畏惧的，这些分裂分子将逐渐被淘汰，越盟将横扫一切，而它自己将是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政党。”^③果然，随着越南革命的发展，这些历史渣滓都被扫出了越南。

说来也很奇怪，这些越南的历史渣滓都向旧中国方面倾倒，而我很惭愧，却不由自主地充当了这些越南历史渣滓的“见证人”！

写到这里，我回想起受命赴越，路过昆明，游览大观楼，见

近华浦有联云：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

欲上高楼更泊舟。

这对我这次越南之行是多么绝妙的写照！

① 见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第 1155 页。

② 于斌，号野声，1921 年我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的同学。他在政治上十分反动，一贯效忠于蒋介石。三十年代即升任南京天主教总主教，到台湾后一跃而为枢机主教，即有权参加教皇选举的红衣大主教。1978 年 8 月 16 日，未及参加教皇选举（8 月 25 日）即在罗马逝世，终年七十七岁。

③ 见《萨朗回忆录》第一卷第 337 页。